

《三国演义》对应用文的吸收及其文学特点

谭真明

(长沙学院 影视艺术与文化传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22)

摘要:在中外文学史上,罗贯中是第一个将书信等应用文体引入作品之中的作家。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使用了书信等19种共计334道应用文。这类文体的艺术功能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连缀情节和人物,二是作为政治、军事和外交斗争的工具,三是表现人物的思想和性格。其文学特点有三:一是体制短小,言简意赅;二是散韵兼行,以韵文为主;三是情感丰富。《三国演义》中之所以存在大量应用文体,一是与作品的文体特色有关,二是与作品所叙写的内容有关。罗贯中在不违背艺术真实的前提下,对《三国志》中的书信等应用文作了符合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原则的加工和改造。

关键词:应用文;艺术功能;文学特点;《三国演义》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0)05-0100-04

《三国演义》是一部文学色彩很浓的历史演义,而书信、表奏、诏敕之类是纯粹的应用文体,二者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但罗贯中却在我国古代小说史上第一次将书信等应用文体大量、频繁地运用到自己的作品中。书中的许多重要关目和重大事件如桃园结义、董卓之乱、帝王废立、孙坚阵亡、徐州解围、官渡之战、蒋干中计、东吴招亲、曹操平西凉、孙权遗书退老瞞等,都与书信等应用文体的使用效应有关。据统计,全书除了第8、12、25、27、34、38、39、41、42、44、46、48、50、51、68、69、70、78、88、89、90、95共22回之外,其他每回都运用或提到了应用文体,有的章回运用了多种应用文体。作品中共有包括书信在内的各类应用文334道(含作品中提到而未见其原文者),其中榜文7道;诏书52道;檄文9道;表54道;策文2道;盟誓1道;书信172道;奏章9道;诰2道;谕2道;世谱1道;借条1道;祭文4道;军令状5道;对联1道;敕文5道;疏4道;碑文1道;遗书4道。这是中外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而迄今学界对此一值得研究的文学现象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类文体在作品中具有怎样的艺术功能?体现出哪些主要的文学特点?在中国古代数以百计的长篇小说中,为什么只有在《三国演义》中才出现如此数量众多的应用文体?以及作者是

如何利用和改造《三国志》中的应用文的,这些问题就是本文试图分析、解决的。

一 《三国演义》中书信等应用文体的艺术功能

我国应用文体的出现和使用具有悠久的历史。殷墟甲骨刻辞是我国最早的应用文。《尚书》是我国最早的应用文集。《文心雕龙·书记》中说:“三代政暇,文翰颇疏;春秋聘繁,书介弥盛。”说明从春秋时期起各类事务文书已广为流行,但直到清代刘熙载才第一次明确提出“应用文”这一概念。他在《艺概·文概》中云:“辞命体,推之即可为一切应用之文。应用文有上行,有平行,有下行,重其辞乃所以重其实也。”应用文的范围极其广泛,包括一切事务文书和政务文书,但无论哪一类,基本功能是“工具”作用。鉴于书信、诏书、表奏在《三国演义》中不仅数量多,而且对情节发展和塑造人物形象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以它们为代表,重点分析其在作品中独特的艺术功能。

(一)连缀情节和人物、决定故事情节发展的工具

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说:“《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而其叙事之难则有倍

难于《史记》者。《史记》各国分书,各人分载,于是有本纪、世家、列传之别。今《三国》则不同,殆合本纪、世家、列传于一体。分则文短而易工,合则文长而难好也。”《三国演义》叙写了从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一百余年间重要的社会历史事件,再现了魏蜀吴三个集团的兴衰过程,政治、军事、外交斗争之纷纭复杂,人物之多,空间之广,头绪之乱,创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之最。罗贯中解决“合而难好”的难题的一个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借助于书信等应用文体,把不同的人物和事件联系起来,使头绪纷繁的故事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如第1回写张角犯境,幽州太守放榜招募义兵,通过一道榜文,很快就将刘备、关羽和张飞这三个本来素不相识的人联系在一起“桃园三结义”。第3回写何进矫诏各路诸侯进京“清君侧”,久怀不轨之心的董卓得书后“大喜”,立即亲率二十五万西凉大军杀奔长安,从此故事情节变得极其复杂惊险。正是何进的一封矫诏,不仅将自己送上了断头台,也开启了短命然而祸国殃民的“董卓时代”。曹操行刺董卓不成,被董卓“遍行文书”缉拿,似乎曹操从此淡出了政治军事斗争的舞台,但第五回曹操凭借一道矫诏和一道檄文,将十七路诸侯集结成讨伐董卓的联盟,后来魏蜀吴三个集团就是脱胎于此。第29回,盘踞江东的孙策求为大司马而曹操不许,孙策便有袭许都之意,于是吴郡太守许贡上书给曹操,建议曹操诏孙策还京师以便控制孙策,不料密书为孙策部将截获,许贡被杀。后来孙策在丹徒之西山打猎时,又遭到许贡的三个家客的伏击,孙策身受重伤而亡,孙权开始掌江东之事。第65回写刘备入主益州后评定五虎上将,远在荆州的关羽耻于与马超同列而写信给刘备,要入蜀与马超比武,情急之下诸葛亮马上修书一封给关羽,晓以利害,成功地阻止了两虎相斗必有一伤的结局。类似于这样的因为一封书信而引起曲折、重大的情节、人事变化的例子在作品中俯拾皆是。

(二) 政治和军事、外交斗争的工具

传统的书信之文作为一种应用文体,其内容主要用于抒写个人情怀,交流沟通信息,或者劝诫应酬,而《三国演义》的每一封书信几乎都被赋予了重大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斗争的内涵。《文心雕龙·书记》中虽然认为书信等应用文体是“艺文之末品”,但同时肯定其为“政事之先务”,《三国演义》中的书信等文体就发挥了“先务”的重要

作用。如第4回李儒不宣读完策文,董卓废少帝而立献帝的程序就不算完成;第5回,袁绍不宣读盟誓,建立讨伐董卓的联盟的程序就不算完成;第80回焦周不朗读完祭文,废除汉献帝的程序也不算完成。第9回吕布不发矫诏,董卓就不会放心大胆从郿坞回到长安,董卓回来后,吕布不宣读矫诏就不会理直气壮地动手搦死董卓。第11回写曹操为报父仇而欲血洗徐州,刘备修书望其“先朝廷之急而后私仇”,曹操得书后乃撤兵。第34回当官渡之战处于相持阶段时,曹操怯于袁绍势大力壮,是进是退举棋不定,便写信向远在许昌的谋士荀彧咨询。荀彧在回信中仔细分析了双方的形势,力劝曹操在此“用奇之时,断不可失”,建议曹操“画地而守,扼其咽喉而使不能进,情见势竭,必将有变”,要曹耐心等待机会。曹“得书大喜,令将士效力死守”,后来曹操果真出奇制胜,消灭劲敌袁绍,为统一北方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毛宗岗在夹批中说:“文若一书,关系非小。”第60回“孙权遗书退老瞞”也是书信运用于军事和外交斗争的一个范例——孙权和曹操在濡须坞对峙数月,双方各有损益。孙权致信曹操:“即日春水方生,公当速去。如其不然,复有赤壁之祸矣。”曹操阅信后“重赏来使,遂下令班师”。第45回赤壁大战前夕,一封由周瑜杜撰、并故意让蒋干偷窥并带回江北的所谓蔡瑁、张允的通敌文书,使得本来不习水战的曹军损失了两名训练有方的水师都督,从而去掉了周瑜的一块心病,双方力量对比瞬间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第59回写曹操与马超旷日持久的战斗中,采用“抹书”的方式,轻易地离间了韩遂和马超的关系。曾经感叹“超儿不死,吾无葬身之地”的曹操,仅凭几封故意涂抹的书信,即取得战场上几十万大军不能取得的辉煌战果。诸如此类的利用书信作为政治和军事、外交斗争的工具的例子,在作品中同样不胜枚举。

(三) 表现人物思想和性格的工具

《文心雕龙·书记》中说:“书者,舒也。”与其他文体相比,书信等应用文体更容易自由地抒发、展现人物的思想、情怀和风采。刘勰就曾高度评价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志高而文伟”、杨惲的《报会宗书》“志气盘桓,各含珠采”。《三国演义》中的书信也表现了不同人物的品质和性格特点。如第四回袁绍给王允的信表现了他对董卓侮辱自己的“恨”,第26回关羽作书辞别曹操突出他不忘故主之“义”,信末“其有余恩未报,愿俟之以

异日”又为华容道义释曹操伏线;第30回荀彧给曹操的复信表现了他“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之“谋”;第45回由周瑜伪造二蔡给自己的通敌文书表现了他的“智”;第54回周瑜向孙权献真假美人计的两封信又表现了周瑜殚精竭虑为东吴效力的“忠”;第59回曹操抹书间韩遂表现了他的“奸”;第60回“孙权遗书退老瞒”表现了他的“诚”;第65回关羽要与马超比武的信表现了他的“傲”;第67回汉献帝册立曹操为魏王,曹操三次上书拒绝;第80回汉献帝降诏让位于曹丕,曹丕三次上书不受,表现了曹氏父子的“伪”;第103回诸葛亮的给曹真和司马懿的挑战书表现了他的“计”,等等。特别是第33回写袁熙、袁尚在曹操的追击下往投辽东太守公孙康,夏侯惇等劝曹操乘胜追击。但曹操读了郭嘉给自己的遗书后笑曰:“不劳诸老虎威,数日之后,公孙康自送二袁首级至矣。”诸将皆不信。不久,公孙康果然遣人送来二袁首级,原来郭嘉在遗书中分析说,公孙康久畏二袁吞并自己,二袁往投必遭其疑忌而相互残杀。若曹操以兵力击之,他们必合力拒曹。若缓图之,公孙康必与二袁不容。这封遗书表现了郭嘉的“识”。

二 《三国演义》中书信等应用文体的文学特点

陈独秀在为汪原放标点本《三国演义》作序时曾经指出,广大失学者、青年学徒和店员们都可以从《三国演义》中学习写作应用文。这实际上肯定了作品中应用文的文学价值、审美价值。笔者认为,《三国演义》的应用文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 体制短小,言简意赅

作品中各类应用文无论所涉何事,大多短小精悍,以几十上百字为主。如第26回关羽写给刘备用以消除误会的复信不超过一百五十字;第102回写魏主曹睿在司马懿出兵前手诏韬略曰:“卿到渭滨,宜坚壁固守,勿与交锋。蜀兵不得志,必诈退诱敌,卿慎勿追。待彼粮尽,必将自走,然后乘虚攻之,则取胜不难,亦免军马疲劳之苦:计莫善于此也。”寥寥六十余字表达了丰富而深刻的战略战术思想。

(二) 语言通俗,散韵兼行,而以韵言为主

明代中叶的蒋大器在《三国志通俗演义·

序》中认为《三国演义》是一部“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巨著。应该指出的是,所谓的“文”,主要是指行文的艺术表现技巧,而“言”主要是指语言风格。总的来说,《三国演义》中的书信等应用文在总体上体现了这种基本特点。所不同的是,这类应用文体大多以韵言为主。如第26回关羽给曹操的辞别信、第37回刘备给诸葛亮的留言等等。曹道衡先生曾经在《中古文学史论集·关于魏晋南北朝的骈文和散文》一文中指出:“到了汉代……当时同一作者所写的学术和历史著作,句子的长短还比较参差,而书信等应用文字,排句就多些。”^①其实,不唯汉代,我国自古以来的书信等礼仪文书基本上都是采用韵语。究其原因,笔者以为,韵语在书面交际活动中的广泛运用应该与我国古人重视礼仪的文化传统有关。我国是文明礼仪之邦,在表情达意方面,古人无论是口头交往还是书面交往,都特别讲求礼仪。而在书信、奏章、诏敕等书面文体中使用韵语,往往显得庄重、高雅、严谨且富有气势,更有利于表达作者思想和情感。这样就不难理解,我国古代发展得最好的文体还是以诗词(特别是诗)为代表的韵文。由此我们也基本上可以解释为什么罗贯中无论是采用史料中的应用文还是其自创的,都体现了当时书信文体的语言风格。

(三) 情感色彩浓厚

无论是臣子的表奏、帝王的诏敕,还是集团内部之间的通联文书,字里行间洋溢着丰富的情感。如第104回诸葛亮的临终遗表,第57回周瑜给孙权的遗书,都写得情深意切,感人肺腑。特别是第20回汉献帝给董国舅的血字诏书,更是沉痛至极,愤懑至极,渴盼至极。作品中的书信等应用文体之所以具有情感丰富的特点,与前文所述这类文体往往事关重大的政治、军事、外交斗争有关,并不是一般的传达信息、交流感情。

三 《三国演义》应用文体多样的原因及对《三国志》中应用文体的利用和改造

《三国演义》中应用文体之多,居中国古代小说之冠。其所以如此,笔者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与作品的文体特色有关。作品的性质是历史演义。历史演义重在再现历史人物的活动,这些人物在政治军事和外交活动中本来就离不开

^①曹道衡:《中古文学史论文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86页。

事务文书的充分运用;又因为是演义而不是历史,故在演绎历史事件的过程和历史人物的活动时,可以对包括应用文体在内的史料进行加工改造和适当的虚构。如官渡之战时,曹操与袁绍旷日持久而不能取胜,因军粮日短而欲退兵,乃写信给远在许昌的荀彧。荀彧回道:“今军食虽少,未若楚、汉在荥阳、成皋间也。是时刘、项莫肯先退,先退者势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众,画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进,已半年矣。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荀彧给曹操的复信与《三国志·荀彧传》中的复信的内容大体相同,但在语气与词采方面有很大区别。又如《三国志·关羽传》中写关羽辞别曹操时只用了“羽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于袁绍”几句,但罗贯中却在作品中煞有介事地使用了辞别文书。《三国志·周瑜传》中周瑜并没有书信活动,但《三国演义》中的周瑜却有他伪造二蔡给自己的通敌文书和向孙权献真假美人计的两封书信,从而使故事情节变得跌宕起伏、妙趣横生。应该注意的是,作者在改造和杜撰书信时,能够虚拟悬想当时人物的内心世界,使这些书信遵循了人物性格决定情节发展的逻辑,因而符合艺术真实的原则。如

第60回孙权遗书退老瞒一节,正如毛宗岗所评:“操以权为英雄,权亦以操为英雄”,“操畏权,权亦畏操”,孙权作书于操、操自退兵也就在情理之中;又如关羽自视甚傲,他写信给刘备要与马超比武也是性情使然,而诸葛亮知道其好胜心强,故回信中以武艺“超群绝伦”的美词慰勉之,知其责任心强,又以“荆州有失,罪莫大焉”的严词警戒其不可擅离职守。这些书信骈散结合,文质兼备,集实用功能和审美功能于一体,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作者高超的艺术水准。

二是与作品叙写的内容有关。一般的历史演义主要是按照时间顺序再现一个王朝的兴亡史,并且故事的发生地主要在宫廷,头绪相对简单,而《三国演义》描述了一个王朝实质上的覆灭以及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极其复杂的较量,时间跨度百余年,人物众多,头绪纷繁,故事的发生地广布于海内。作为形式上的汉帝在很长时间内依然是名义上的指挥者,所以作品中君臣之间的诏敕和表奏就多达一百余封。即使是一个集团之间,政务和军务活动也很频繁。在通信技术不发达的古代,书信是对内对外沟通和联系的主要手段之一。

On the Absorp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Shu Qiwen by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and Its Literary Significance

TAN Zhen-ming

(School of Television Arts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Changsha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22, China)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ture, Luo Guanzhong was the first as well as the only writer to bring applied texts, such as letters, into his work. In his novel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a total of 19 kinds and 334 applied texts including letters are used. This artistic function is embodied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i.e. the intertwined plot and the characters; the weapon of political, military and diplomatic struggle, and the tool to express the thought and personality of the character. There are three literary features, namely short system, concise words but rich meanings; both rhyme and rhythm, mainly verses, and rich emotions. The reason why there are a large number of applied styles in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is related to the styl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ork and the content described in the work. Luo Guanzhong carried out the transformation and processing of the traditional Shuqiwen in line with the true principle of art, which has important literary significance.

Key words: applied text; artistic function; literary feature; artistic truth; historical truth

(责任校对 龙四清)